

蒙元水軍之興起與蒙宋戰爭

蕭 啓 慶

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

(一)

蒙元水軍之興起，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具有兩點重大意義：第一，自政治及軍事史觀點言之，蒙元憑藉其新興水軍，征服南宋，成為第一個克服江淮天塹而統治全中國的游牧民族所建王朝。第二，自中國海權發展史觀點言之，蒙古人與南宋爭戰四十年，逐漸建立起一支強大水軍，承繼南宋的海權而加以發揚，中國海權史的巔峯得以在明初出現。¹

自窩濶台汗（Ögödei Qaghan, 1229-1241）於一二三四年滅金後，蒙古人業已掌握中原的人力與物力。但欲進一步征服華中、華南，必先克服地理的障礙及南宋水軍的優勢，却非易事。中國南北地形迥異，作戰方式因而不同。中原多平原曠野，利於騎兵馳突，南方則河川縱橫，湖泊密佈，攻守多賴舟楫。「南船北馬」一諺所反映的不僅是兩地區交通工具的不同，也是戰爭工具的歧異。北人較善弓騎，而南人獨擅舟楫，各有所長，乃是自然環境所造成。歷史上的分裂時代，「任何北中國之強大武力如不能獲得水軍優

1 故羅榮邦（Jung-pang Lo）教授曾著三文，闡論宋元明三代海權的發展：“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Sea Power during the Late Sung and Early Yüan Periods,” *Far Eastern Quarterly* 11:2 (1952), pp. 489-509; “Maritime Commerc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Sung Nav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2:1 (1969), pp. 57-101; “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Ming Navy,” *Oriens Extremus* 4 (1958-1959), pp. 149-168。

勢或堅強之海上力量，即不能統一中國」。²但是華北舟材、水手皆不充裕，營建強大水師並非易事。北方政權如欲征服江南，必先掌握兩淮、荆襄、或四川等南北間的漸移地區，然後營建水師，始有成功可能。晉、隋、宋之統一中國皆是循此軌轍。而元朝以前邊疆民族所建各王朝，都僅能割據華北，而無法一統天下，不能以強大水軍克復江淮天塹乃是主要原因。

南宋江海水軍，兩俱壯大。主要為適應國防之需求，而其社會經濟條件亦足以配合。南宋立國，乃是憑藉「襟江帶海」的形勢。東側倚大海為屏障，北方則以淮河、漢水為第一防線，長江為第二防線，而其三大防區——兩淮、荆襄（京湖）、川蜀——皆須憑藉長江加以貫穿。因此整個國防必須以強大水軍為支柱，始能抵消金人的優勢騎兵。自高宗初建水軍後，至南宋中期，已建立水軍廿餘支，長江中下游及兩浙沿海地區尤為水軍佈防重點所在。³ 鄂州（今湖北武昌）、池州（安徽貴池）、建康（南京）、鎮江、江陰、許浦（江蘇常熟縣許浦）、嘉興、臨安（杭州）、定海等地皆置水軍。又在建康、定海設立沿江、沿海制置使司，分別指揮江上及海上水軍，實力之強大與組織之完善都屬空前。而江南社會經濟之發展亦足以支持強大水軍。江南濱海各路已成為人口稠密之經濟重心，都會繁榮，海外貿易發達，造船業進展頗大⁴，商船衆多。水軍之船艦及水手皆得源源補充，不虞匱乏，而火器之運用更增加水軍之威力。宋人之能抵禦金人南侵，主要倚恃水軍。紹興年間戶部尚書章誼（1078—1138）所說：「巨浸湍流，蓋今日之長城也。」

2 包遵彭，中國海軍史（台北，1969），上册，頁141。

3 研究南宋水軍的論著，除前引羅榮邦的論文外，尚有曾我部靜雄，「南宋の海軍」，載於『羽田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京都，1955），頁585—607；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1983），頁170—180。

4 南宋造船的水平，可自一九七四年在泉州出土海船殘骸看出，其技術水平已具備建造遠航海軍戰船的條件（見泉州灣宋代海船復原小組，「泉州灣宋代海船復原初探」，文物1975.10，頁28—38）。宋代新型戰船有鐵壁鏢嘴海鵲戰船，多槳船、高速車船、無底船等。重要造船地有虔州（江西贛州）、吉州（江西吉安）、明州（浙江寧波）、婺州（金華）、溫州、台州、潭州（湖南長沙）、鼎州（常德）、嘉州（四川樂山）、楚州（江蘇淮安）、鳳翔（陝西鳳翔）等，其中明州、泉州、廣州所造航海大船，尤為著名，參看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1981），頁165—168；章巽，中國古代的海上交通（北京，1986），頁66—67，金秋鵬，中國古代的造船和航海（北京，1985），頁102—111；Joseph Needham et. al.,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4, pt. 3 (Cambridge, England, 1971), pp. 439—486。

樓船戰艦，蓋長城之樓櫓也」；⁵ 確實反映了長江大海及水軍在南宋國防上之重要性。而羅榮邦教授所云：中國史上的海權時代乃由南宋奠立基礎，確是不錯。⁶

蒙古人崛起朔漠，東征西討，所向無敵，主要倚恃其精良騎兵。英國著名軍事學家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 1895-1970）曾說：「運用單一軍種——騎兵——是蒙古人不斷勝利的秘密」，「運動力為其戰略及戰術上的王牌」。⁷ 不過騎兵僅在平原野戰中最具威力。中國古代兵籍便認為：林木叢茂之地、沼澤難行之地、澗谷山阜之地、溝坑坎坷之地等，均為騎兵的「敗地」、「死地」。⁸ 遇到長江大河、高壁深壘，騎兵更是一籌莫展。蒙古大將阿朮（Aju, 1227-1281）在率軍進攻襄陽時便曾奏稱：「所領者蒙古軍，若遇山水、砦柵，非漢軍不可。」⁹ 由上可見，蒙古騎兵之運作，受到各種地形、地物之限制，並非無往而不利。如以為蒙古之征服天下唯賴騎兵，則為一錯誤觀念。在滅金、西征過程中，隨着征戰地區地理條件的變化，蒙古人不斷吸收各民族的資源與人力，形成一支以騎兵為核心而兼擁步、工、砲等軍種的複合大軍，而水軍則是適應對宋作戰需求而成長的軍種。

本文旨在探討蒙元水軍形成和成長的過程以及其在蒙宋戰爭中所起作用，並對蒙古人何以能建立強大水軍及克復宋朝水軍之優勢等問題略加說明。至於個別戰役中水軍的作用，近年出版有關宋元戰史的著作中都有詳瞻的討論。¹⁰ 本文僅在必要時提及而不擬詳論。本文論題與羅榮邦教授諸文所論，有部份重疊之處。但羅教授着重蒙元水軍成長後在發揚中國海權中所起的作用，與本文輕重有別，或可並行而不悖。但本文之撰寫受羅教授諸文之啓發甚大，謹誌銘感。

5 黃淮等編，歷代名臣奏議（台北，1964）卷334，頁12b—13a，「舟師水戰之利」。

6 Jung-pang Lo, "Emergence of China," pp. 489-490.

7 B. H. Liddell Hart, *Great Captains Unveiled* (Boston, 1927), pp. 27 and 32.

8 曾公亮，武經總要（四庫珍本初集），卷4，頁6b—7a，「用騎」；袁庭棟、劉澤模，中國古代戰爭（成都，1988），頁333。

9 元史（北京，1976），卷6，頁118。

10 陳世松、匡裕徹等，宋元戰爭史，成都，1988；李天鳴，宋元戰史，全四冊，台北，1988。此外，胡昭曦、鄒重華編，宋蒙（元）關係研究（成都，1989）亦載有戰史多篇，頗具參考價值。

(二)

蒙元水軍的起源與成長，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一段從無到有，由弱至強的漫長過程。草原階段的蒙古軍，不僅沒有水軍，也沒有真正的船舶，僅有就地取材而製成的簡易濟水工具，其情形和其他游牧民族相似。蒙古人祖先室韋人「渡水則束薪爲棧，或以皮爲舟者。」¹¹十三世紀初年的蒙古人仍是如此。成吉思汗（Chinggis Qan, 1206-1227）崛起之初，與王罕（Ong Qan, ?-1203）及札木合（Jamugha, ?-1205）結爲聯盟，攻擊其宿敵蔑兒乞（Merkit）人，便是乘坐以豬鬃草（*saqal bayan*）結成的筏子（*sal*）而渡河。¹²除草筏外，蒙古人尚有渾脫（以渾脫羊皮製成之浮囊）、¹³皮筏等。¹⁴但這些都是浮渡工具，而非戰鬥工具。

蒙元水軍萌芽於綿亘廿餘年的蒙金戰爭中，但在此期間，真正的水軍並未形成。中原地形有利於騎兵，有如郝經（1223-1275）所說：「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¹⁵由於氣候關係，華北各河道平均流量少，¹⁶不僅缺少航運之利，而且可以涉渡之處甚多。加以蒙軍作戰多在冬季，華北河流冬季多結冰，渡河更不煩舟楫。西元一二三二年正月窩闊台汗對汴京發動大攻勢，其軍便是在白坡（河南孟津黃河北岸）之西「策馬涉河」，¹⁷而執行大迂迴戰略的拖雷（Tolui, ?-1232）軍則在均州（河南禹縣）「乘騎浮渡漢水」。¹⁸在黃河及其各支流上，金朝亦無強大水軍足以阻止蒙軍超越水障礙。海陵王（1149-1161）伐宋前，雖曾在

11 隋書（北京，1973），卷84，頁1882，「北狄傳」。

12 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并註釋（台北，1979），頁109。

13 參看光遠「釋渾脫」，內蒙古社會科學，5（1983），頁119—121。

14 關於內陸亞洲各游牧民族的浮渡工具，參見Denis Sinor, "On Water-transport in Central Eurasia," 收入 Sinor, *Inner Asia and Its Contacts with Medieval Europe* (London, 1977), 156—179。

15 郝經，陵川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2，1a—10a，「東師議」。

16 馮繩武等，中國自然地理（北京，1989），頁154。

17 元史卷 124，頁3052，「速哥傳」。百衲本原作「策馬沙河」。點校本校勘記認為應改「沙」爲「涉」（頁3060），茲從之。

18 元史卷 115，頁2886，「睿宗傳」。

通州（河北通縣）之潞河（即白河）大建水師，但係以海上水軍為主，而且海陵之水軍已覆沒於一一六一年陳家島及采石二役。¹⁹金廷南遷汴京後，為阻擾蒙軍追襲，更於一二一六年下令「沿河唯存通報小舟，餘皆焚之」。²⁰三年後雖曾敕命「沿河造戰艦，付行院、帥府」，²¹但是亡羊補牢，成效顯然有限。金軍的少量戰艦不足阻止蒙古進軍，蒙軍運用步、騎兵即足以制服。如一二三一年漢軍將領濟南張榮（1181—1263）在河上奪獲金艦五十艘。²²明年窩闊台汗由白坡渡河後，獲「漢船」七百餘艘，²³而漢將石天祿（1183—1236）從大將塔思（Tas, 1212—1239）圍汴，也擄得戰船數艘。²⁴在這些戰役中，蒙方都沒有運用戰艦的跡象。

這一時期，蒙軍遇到水障礙時，往往仍以簡易濟水工具渡越。一二三三年，蒙軍圍攻金帝於蔡州（河南汝陽），便是結筏潛渡汝水，以達蔡州。²⁵蒙古西征中亞的情形亦是如此。一二二〇年哲別（Jebe, ?-1224）與速別台（Sübētei, 1176-1248）追逐花刺子模算端札蘭丁（Jalāl-ad-Din）至阿姆河（Amu-darya），乃命其軍以牛皮裹樹枝作袍（革囊），藏軍械服用於其中，繫袍於身，手握馬尾，隨以泳水，舉軍畢渡。²⁶

不過，在伐金與西征過程中，有時因地形之需求不得不置備船舶。一二二一年大將木華黎（Muqali, 1170-1223）於攻取葭州（陝西佳縣）後，接受右副元帥石天應（？—1222）的建議而造舟楫、建浮橋，以供當地防守之需。²⁷據高麗史記載，一二三二年高麗曾應蒙廷之要求而派遣船舶三十，水

19 關於海陵營建之水軍及其覆滅，參看陶晉生，金海陵帝的伐宋與采石戰役的考實（台北，1963），頁41-42，96-100，150-166；王曾瑜，「南宋對金第二次戰爭的重要戰役述評」，載於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1989），頁315—332。

20 金史（百衲本）卷14，頁22a，「宣宗本紀上」。

21 同上卷15，頁22b，「宣宗本紀下」。

22 元史卷150，頁3558，「張榮傳」。

23 聖武親征錄（蒙古史料四種本），頁206。

24 元史卷152，頁3602，「石天祿傳」。

25 同上，卷120，頁2966，「肖乃台傳」。

26 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London, 1968), pp. 420-421.

27 元史卷149，頁3526，「石天應傳」。

手三千，²⁸當是備渡河攻汴之用。在此期間，蒙軍更有「砲水手軍」及「船橋軍」的設置。早在蒙軍初入中原時，燕人薛塔刺海（Tarqai, ?-1232）於一二一四年已受命爲砲水手元帥。²⁹後來成吉思汗征花刺子模，軍至「莫蘭」河，³⁰不能涉，清州（河北青縣）張榮（1158—1230）於一月之內，「縛戰艦百艘」，成吉思汗獎其功，稱之爲「兀速赤」（*usuchi*，即水手），並任命爲砲水手元帥。³¹但是，此時之砲水手軍顯然是一種遇城架砲，臨水造船的工兵。張榮便是以匠軍管領的身份負責造船的。³²而且當時造船機會不多，砲水手軍之任務係以架砲爲主。薛塔刺海從征西域諸國，「俱以砲立功」，而張榮後來也因砲受傷。砲水手軍下顯然並無常備艦隊。又有張札古帶（Jaqudai）因從拖雷伐金有功，受命爲河東南北路船橋隨路兵馬都總管。³³這種船橋軍大概也是臨水造船或架造浮橋的一種工兵。

總之，蒙金戰爭時期的蒙古軍中並無常備水軍，而有臨河造船的水手軍及船橋軍。不過，水手軍與船橋軍應可視爲正規水軍之前身。

（三）

蒙古水軍的形成是由於對宋戰爭的需求。以後則隨着對宋戰略的變化，而逐漸壯大，執行不同戰術任務。自一二三五年窩闊台汗初度出兵攻宋，至一二六〇年忽必烈汗（Qubilai Qaghan, 1260-1294）立國中原止，蒙宋戰爭陷於膠着狀態。前廿年間，蒙古因限於國內政治情勢以及受到軍力——尤其是缺乏水軍——的制約，並無一舉滅宋的企圖，僅不斷採取有限目標的攻

28 鄭麟趾，高麗史（東京，1908）卷23，頁346。

29 元史卷151，頁3563，「薛塔刺海傳」。

30 「莫蘭」非該河本名，而爲蒙文 *müren*（河）之音譯。王國維疑即阿梅·沐漣之略，即阿姆河（Amu-darya），見西遊記校注（蒙古史料四種本），下，10a。

31 胡祇遯，紫山先生大全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6，頁18b-20b，「清州張侯神道碑」；元史卷151，頁1381，「張榮傳」。

32 張榮之爲匠軍將領，亦可從李志常西遊記中的記載看出。全真教主邱處機應成吉思汗之召西行，於阿里馬（Almaligh）之東園，遇窩闊台麾下之「大匠張公」。此一「大匠張公」，王國維疑即張榮（西遊記校注，下，10a）。如此說正確，則砲水手軍爲一種匠軍更有可能。

33 元史卷165，頁3880，「張萬家奴傳」。

擊，蹂躪長江以北的宋朝土地，削弱其抵抗力量，並破壞當地政治社會結構，以達到逐漸動搖宋朝國本的目的。³⁴ 蒙哥汗（Möngke Qaghan, 1251-1259）即位後，則以爲大舉攻宋時機已臻成熟，乃於一二五八年三路出軍，一改窩濶台以來多路並進，全線進攻的方針，而改採取蜀出峽，南北對進，會師鄂州，南下臨安的策略，將攻擊重點置於四川。窩濶台的戰略顯然缺乏主攻方向，兵力分散，難能有成。而蒙哥的戰略則過于迂遠，且將主要兵力耗費於南宋在四川設置堅不可破的山城防禦體系之間，徒勞無功。這兩種戰略都不能集中優勢兵力，進攻長江中下游的宋朝心臟地區。淮、漢地區河流縱橫，而且長江中下游爲南宋水軍佈防重點，蒙古缺乏水軍，無法達成重大突破。

在這廿餘年中，蒙古雖不能採行有效戰略，但由於與宋朝在三大戰場上不斷爭戰，爲適應作戰需要，各戰場上的蒙古軍都先後建立了水軍。

伐宋初期，蒙古、漢軍仍然常以簡易浮渡工具作爲渡河或戰鬥之用。運用皮筏及皮囊渡河之例不少。如一二三五年漢軍將領梁瑛（1191—1256）從塔海紺孛（Taqai Gambu）征蜀，宋人守瞿塘峽，瑛作皮渾脫以濟。³⁵二年後，漢軍將領鞏彥暉（1204—1259）隨大將張柔（1190—1268）攻淮西，率浮渾脫者十人，夜渡滁州池水。³⁶又二年汪世顯（1195—1243）在萬州（四川萬縣）乘皮筏渡江擊敗宋軍。³⁷臨時捆造木筏以濟河的例子也有不少。一二三五年塔思部將劉拔都兒統率死士五百，乘新造木筏，進擊漢水上之宋艦。³⁸又如宋督視京湖軍馬魏了翁（1178—1237）於一二三六年奏稱：當時蒙軍在黃陂一帶，「呵習水戶民，結筏攘舟，爲渡河計」。³⁹

即在蒙哥汗時代，蒙軍仍不斷使用皮囊或木筏渡河。忽必烈於一二五三年南征大理，便是乘坐革囊及筏渡越金沙江。⁴⁰據波斯史家拉施特（Rashid

34 陳世松等，前引書，頁371。

35 魏初，青崖集（四庫全書本）卷5，頁1a，「故征行都元帥五路萬戶梁公神道碑」。

36 元史卷166，頁3898，「鞏彥暉傳」。

37 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北京，1962）卷6，頁2b，「汪義武王」；元史卷121，頁2995，「按竺迺傳」。

38 元史卷119，頁2939，「塔思傳」。

39 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四部叢刊）卷28，頁21a—22b，「奏虜犯隨信光黃等處事宜」。

40 元史卷4，頁59，「世祖本紀」。

al-Din, 1247-1318) 說，一二五九年忽必烈引軍攻鄂，「命軍士用樹皮合在一起，做成了木筏」，渡越大江。⁴¹又在四川作戰的契丹將領石抹按只(?—1273)於一二五八年為突破宋軍對敘州(宜賓)馬湖江面的封鎖，集軍中牛皮作渾脫及皮船，乘之擊敗宋軍。⁴²不過，當時蒙軍在各戰場已有小型艦隊，簡易浮渡工具之使用，可能不盡由於缺乏船艦，而是為配合河川條件而採取的因應措施。

早期蒙古水軍船艦的來源，主要有二：一為擄獲，一為自製。各戰區擄獲數目甚為龐大。在四川戰區，一二三六年趙阿哥潘於利州(廣元)嘉陵江上奪蜀船三百艘。⁴³三年後，李穀下萬州，會戰於瞿塘，獲戰艦千餘艘。⁴⁴一二五五年大將兀良哈台(Uriangqadai, 1200—1271)在金沙江上擊敗宋都統張實，奪其船二百艘。⁴⁵蒙哥汗伐蜀時，張立在大獲山奪戰艦百餘艘，⁴⁶李忽蘭吉在釣魚山下奪得糧船四百艘，⁴⁷而漢軍大將史天澤(1202—1275)則在合州(合川)東南黑石峽擄獲宋鉅艦數百艘。⁴⁸在荆襄及兩淮戰場，蒙軍奪得之宋船尤多。如一二三七年張柔部將何伯祥(1203—1259)在德安(湖北安陸)、郢州(鐘祥)一帶獲戰艦千餘艘。⁴⁹張柔於同年亦在黃州西大湖上擄獲宋船萬艘。⁵⁰水軍萬戶解成(?—1262)在焦湖之戰俘宋艦三百，後于一二五九年從攻鄂州，復奪敵艦千餘。⁵¹水軍千戶張榮實(1218—

41 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北京，1985)，頁289；John A. Boyle (trans),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khan* (New York, 1971), p. 248 將「筏」(*tilsan*)誤譯為「符咒」(*talisman*)。

42 元史卷154，頁3640，「石抹按只傳」。

43 同上，卷123，頁3208，「趙阿哥潘傳」。

44 同上，卷150，頁3548，「李守賢傳」。

45 同上，卷121，頁2980，「速不台傳」。

46 同上，卷165，頁3878，「張立傳」。

47 同上，卷162，頁3792，「李忽蘭吉傳」。

48 王恽，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卷48，頁16a，「忠武史公家傳」。

49 元史卷150，頁3544，「何伯祥傳」。郝經「何侯神道碑銘」，則作「得船數萬艘」，顯係誇大。見陵川集卷35，頁33b。

50 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卷26，頁1a，「張公勳德第二碑」。原文云：「得戰船萬艘」。就其數目之大觀之，當為民船，而非戰船。張柔所擄與何伯祥所獲可能為同一事。

51 元史卷165，頁3870，「解誠傳」。解成，傳作「解誠」。屠寄據本紀改作「成」，茲從之，見蒙兀兒史記(結一宜刊本)卷9，頁10a，「解汝楫傳」。

1278)於一二三五年從大將察罕(Chaghan, ?-1255)攻襄陽,於漢水上擄得戰船數十艘。後從忽必烈攻鄂州,又在陽邏堡俘宋大船廿艘。⁵²同一戰役中,董文炳(1217—1278)、文忠(1231—1281)兄弟又擄獲蒙衝百艘。⁵³這些記載或有誇大,但蒙軍先後擄獲數目頗大的宋船,則不容置疑。而且這些宋船種類繁多,有蒙衝、有戰艦、有糧船,也有民船。有的可供作戰,有的則可供運輸。蒙軍當不致隨奪隨棄,前後累積船數甚為可觀。

同一期間,蒙古必也自製了不少戰船。可惜蒙方史料,一無提及,僅能從宋方情報中略窺一二。蒙軍於一二三六年春進圍江陵(湖北今縣),魏了翁向宋廷奏稱:「蒙軍自枝江、宜都境上,伐竹木,毀廬室,斧斤之聲日聞,直欲為渡江計」,顯然是在造船。⁵⁴三年後,宋廷以邊報虜造船於汴,乃遣知招信軍余玠(?—1253)率兵進入河南,予以騷擾。⁵⁵明年,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孟珙(1195—1246)得諜報稱:蒙古軍在鄧州(河南鄧縣)之順陽聚積造船木材,玠乃遣部將王堅(?—1264)率軍潛至敵後,焚其積聚。⁵⁶一二五七年宋沿海制置使吳潛(1196—1262)奏報:山東漢軍將領李瑄(?—1262)在海州(江蘇連雲港市海州鎮)造船。⁵⁷以上各項都是宋方傳聞之辭,這些傳聞是否屬實?蒙古究竟造船若干?是何類型?現已無法解答。

蒙古的正規水軍成立於對宋開戰以後數年間。霸州保定人張榮實在一二三七年已為水軍千戶。⁵⁸而易州定興(河北定興)人解成,以「善水戰」著稱,於一二四〇年更受命為水軍萬戶。⁵⁹解成與張榮實都是作戰於兩淮及荆襄戰場,而在四川戰區,依當時蒙軍使用船艦作戰的情形判斷,當亦有水軍的設置。

52 元史卷166,頁3940,「張榮實傳」。

53 同上,卷148,頁3502,「董文炳傳」。

54 鶴山集卷29,頁1a,「奏外寇未靜二相不咸曠天工而違時幾」。

55 佚名,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四庫全書本)卷33;陳世松,余玠傳(重慶,1982),頁9-10。并參看姚師從吾「余玠評傳」,載於姚從吾先生全集,第六集(台北,1982),頁309—378。

56 宋史(北京,1977)卷412,頁12377,「孟珙傳」;黃寬重「孟珙年譜」,載於黃氏,南宋史研究集(台北,1985),頁68。

57 吳潛,許國公奏議(叢書集成本)卷3,頁87—88,「奏曉諭海寇復為良民及關防海盜事宜」。

58 元史卷166,頁3904—3905,「張榮實傳」。

59 元史卷165,頁3870,「解誠傳」。

在窩闊台汗初度伐宋前後，漢軍將領受命爲萬戶者不過八、九人，⁶⁰而解成得以成爲水軍萬戶，可見水軍已有相當實力，但其實力仍不足以成爲進攻的主力。在蒙哥汗大舉伐宋前，水軍主要用於淮西地區攔截自水上馳援圍城的水軍。據李天鳴的研究，在一二四二年至一二四五年間，蒙古軍倚恃其騎、步兵之優勢，採用水陸協同三面夾擊水戰法——即是「正面由戰艦攻擊敵方戰艦，左右兩岸的軍隊使用弩砲向敵方射擊，並由騎兵予以掩護，以防宋軍上岸攻擊蒙軍的弩砲步隊」⁶¹——，在淮河北面諸隘口的戰役中，屢次擊敗馳援的宋朝舟師。宋兼知揚州李曾伯便曾感嘆：「蓋舟師本吾長技，敵乃習而用之」，⁶²但以後宋軍不再在淮河北面諸隘口佈防，蒙古水軍與宋馳援舟師爭戰於河道廣闊的淮河之上，便多爲宋軍所敗，無法阻止宋軍水路馳援，因而進展不大。蒙古水軍實力更不足與宋軍爭勝於長江之上。蒙古軍雖曾於一二三六年及一二三七年兩次兵臨江上，但都爲宋軍擊潰，⁶³無法達到渡越長江，直搗宋朝心臟地區的目標。

蒙哥汗大舉伐宋時，蒙古軍水戰經驗已豐，而且又於出兵前「募兵習水戰」，⁶⁴實力當又有增長。故在歷次戰役中，水軍已能成功地執行阻援及突破宋軍江上防線的任務。在四川戰區，原駐成都的都元帥紐璘（Ne'üril, ?-1263）率軍一萬五千及戰船二百艘，在敘州（四川宜賓）馬湖江面擊敗宋都統張實所統五百戰艦，然後順利東行，擔任封鎖重慶江面，阻止宋朝援軍的任務。⁶⁵更重要的是蒙古水軍挫敗了宋四川制置使兼重慶府呂文德（？-1269）進援合州釣魚城的舟師。呂文德所率戰船據說達萬艘之多，蒙古水軍在數量上遠居劣勢，但因優勢騎、步兵配合得當，在五次戰役中取得三次勝利，使呂文德救援釣魚城的任務未能完成。⁶⁶此外，在鄂州忽必烈部乘宋水軍主力援蜀未還，運用部份水軍（解成部）及臨時徵集之民船，在潯黃州擊

60 黃時鑒，「關於漢軍萬戶設置的若干問題」，元史論叢 2（1983），頁43—51。

61 李天鳴，「宋元戰爭中元軍的水陸協同三面夾擊水戰戰法」，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1988），頁273—294。

62 李曾伯，可齋雜稿（四庫全書本）卷17，頁11a，「淮閩奉詔言邊事奏」。

63 陳世松等，前引書，頁88及98。

64 元史卷165，頁3876，「朱國寶傳」。

65 陳世松，蒙古定蜀史稿（四川，1985），頁69—70。

66 同註61。

敗宋朝水師，得以順利渡江。⁶⁷總之，此一時期之蒙古水軍在數量上仍居劣勢，但由於陸上兵種的有效協同及戰術運用得當，在歷次水戰中已取得勝負參半的成績。⁶⁸不過若欲作為攻宋決勝之主力，其實力仍有待加強。

(四)

蒙古水軍是在忽必烈即位以後始得茁壯。忽必烈立國中原，而不再以草原作為帝國的政治重心。大蒙古國的性質乃發生根本的變化，蒙宋戰爭的意義亦因而改變。過去蒙古伐宋，不過為其東征西討以創造世界帝國努力的一環。立國中原後，忽必烈必須以中原王者自居，消滅南宋，一統華夏，乃成為政治上之首要目標。對宋的政略及戰略都必須加以修改。在政略的層次，忽必烈一方面施行漢法，加強政治號召，一方面集中一切資源以作攻宋之準備。在戰略的層次，忽必烈矯正蒙哥汗的迂遠策略，採取中間突破，兩翼牽制，然後沿江而下，直搗臨安的戰略方針。因而於一二六七年對位居南北要衝、宋人視為天下咽喉的襄陽、樊城發動主要攻勢，並在兩淮及四川採取牽制性的進攻。

這一新戰略的先決條件是擁有強大水軍，堪與宋軍在漢水與長江之上決一雌雄。忽必烈即位前，其謀臣郝經所上「東師議」便曾建議：「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為梁，水陸濟師。」⁶⁹在此一建議中，郝經強調水軍的重要性。忽必烈採行以荆襄為突破口的新策略，可能由於蒙軍已擁有基本水上武力，並已掌握水戰之奧秘。但此時水軍仍未佔有優勢，唯有加強實力，始可成為發動總攻勢的主要工具。蒙古朝廷上下對此當有共識。監察御史王恽（1227—1304）便曾上「論大作水軍事狀」：

征進舟師，固未嘗闕。然可大作一軍，召募兩淮、黃河上下並南人歸順者，兼用其力，舡艦一依宋法。精選大將，使之專習水戰。⁷⁰

此狀明言蒙古水軍不如宋朝，必須仿效後者，大力加強。較王恽建議更具影

67 李天鳴，前引書，第二冊，頁745—746。

68 同註61。

69 同註15。

70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86，頁13a—13b。

響的是劉整（1213—1275）的獻言。劉整原爲宋知瀘州兼潼川路安撫副使，於一二六一年降蒙，任漢軍都元帥，佐助征南都元帥阿朮圍襄陽、樊城。一二七〇年他對阿朮進言：「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唯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⁷¹ 阿朮遂與他聯合上奏說：「圍攻襄陽，必教練水軍、造戰艦爲先務。」⁷² 此一建議得到忽必烈的批准而付諸實行。劉整顯然並非建議擴張水軍的第一人，但他對蒙古水軍大肆擴的推動與執行出力最大。

忽必烈的擴建水軍，在圍攻襄樊之前已着手進行。在其即位之初，忽必烈即擢任張榮實爲水軍萬戶，⁷³ 合解成所統，此時已有水軍二萬戶。一二六五年，阿里不哥（Arigh Böke, ?-1266）及李璫之亂皆已平定，北顧無憂，忽必烈乃積極籌劃備宋，敕邊軍習水戰，屯田。⁷⁴ 明年，董文炳受命爲鄧州（河南鄧縣）、光化（湖北光化）行軍萬戶兼河南等路統軍副使，造戰艦五百艘，肆習水戰，講平宋方略。⁷⁵ 同年，山東統軍副使王仲仁（？—1273）受命督造戰艦于汴。⁷⁶ 顯然都是準備攻宋。襄樊之圍開始後，陝西四川行省于一二六八年受命造戰艦五百艘，付劉整使用。⁷⁷ 二年後，忽必烈批准阿朮、劉整建議，即命劉整造船五千艘，⁷⁸ 水軍千戶朱國寶（1230—1288）便曾參與督造戰艦。⁷⁹

訓練水師與建造戰艦同時進行。一二六七年均州總管張禧（1217—1291）奉命改任水軍總管，其部增加二千五百人，令習水戰。其中五百七十人來自漢軍將領賈文備（？—1304）部，由千戶郝德昌（1204—1273）率領，參

71 元史卷161，頁3785，「劉整傳」。關於劉整降元之經過及其影響，參看陳世松、喻亨仁、趙永春，宋元之際的瀘州（重慶，1985），pp. 74—87。

72 同上，卷7，頁128，「世祖紀」。

73 同上，卷98，頁2510，「兵志」。

74 同上，卷6，頁106，「世祖紀」。

75 王磐，「趙國忠獻公神道碑」（李正儒修，重印藁城嘉靖志，1924刊，卷9，頁3a）及元明善，「藁城董氏家傳」（蘇天爵，國朝文類〔四部叢刊本〕卷70，頁7a—7b）皆云：「造戰艦數百艘」。「五百」之數係依據元史卷156，頁3670，「董文炳傳」。

76 元史卷6，頁110，「世祖紀」。胡祇遼「同簽東川行樞密院事王公神道碑銘」則曰：「造船未畢，調充眉州管軍萬戶」，見紫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7，頁3a。

77 元史卷6，頁117，「世祖紀」。

78 元史卷161，頁3785，「劉整傳」。

79 元史卷165，頁3876，「朱國寶傳」。

加訓練，據說「波濤洶湧之間，舟楫艘艦，凡所動用，無不開合進退，緩急響應，鉦鼓旗幟，號令一新」，⁸⁰ 訓練可能相當有效。而劉整受命大造戰艦後，更是「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共訓練了七萬餘水軍。⁸¹

水軍的編制亦隨着船艦、人員的增多而擴大。襄樊前線水軍卽有四萬戶，劉整於一二七一年受命統領。⁸² 同時設有水軍總管府，漢人文臣游顯（1210—1283）任總管水軍萬戶，當爲管理水軍四萬戶者。⁸³ 一二七二年此一水軍總管府卽遭廢除。此後四萬戶當直屬於指揮荆襄戰場的荆湖行樞密院。此時任水軍萬戶者有張榮實、⁸⁴ 解成之子解汝楫、⁸⁵ 張禧（一二七三年始升任爲萬戶），⁸⁶ 帖木兒·不花（Temür Buqa，淄萊水軍萬戶）⁸⁷ 等。另有鄧州新軍萬戶忙兀台（Mang'udai）於一二七一年治水軍於襄陽之西漢水南岸的萬山，⁸⁸ 可能亦爲水軍萬戶。中下級水軍將領現尙知名者則有王守信（1238—1293，張榮實部千戶）、⁸⁹ 朱國寶（解汝楫部鎮撫）、⁹⁰ 哈刺解（Qaradai，1237—1307，鎮撫）、⁹¹ 郝德昌（張禧部千戶）、⁹² 邢德立、張志（皆千戶）、⁹³ 寧玉（1232—1302，攝□□府事，兼主浮梁津渡，教習水戰）⁹⁴ 等人。由上可知，水軍將領絕大多數爲漢人，所統部隊亦爲漢軍。不過將領中亦有少數蒙古、色目人。帖木兒·不花爲蒙古荅荅里帶（Tatardai）人，所部爲淄萊水軍，原來當爲李璫舊部。忙兀台爲蒙古達達兒（Tatar）

80 青崖集卷5，頁12b，「故水軍千戶郝公神道碑」。

81 同註78。

82 同上。

83 姚燧，牧庵集（四部叢刊）卷22，頁1a，「平章政事游公神道碑」。

84 元史卷166，頁3965，「張榮實傳」。

85 同上卷165，頁3870，「解誠傳」。

86 同上卷165，頁3865，「張禧傳」。

87 同上卷132，頁3219，「帖木兒不花傳」。

88 同上卷131，頁3186，「忙兀台傳」。

89 牧庵集卷23，頁12a，「同知廣東宣撫司事王公神道碑」。

90 同註79。

91 元史卷132，頁3216，「哈刺解傳」。

92 同註80。

93 元史卷6，頁122，「世祖紀」。

94 閻復，靜軒集（藉香齋拾本）卷5，頁48b—50a，「沿海上萬戶寧公神道碑銘」。

氏，所統爲鄧州新軍，原爲真定史氏舊部。哈刺解爲色目哈刺魯（Qarlugh）人，其部可能亦爲漢軍。此外，清州張榮之孫張君佐（1237—1307）、⁹⁵薛塔刺海之孫薛四家奴，⁹⁶此時均任砲水手元帥，在襄樊作戰，其部可能亦有水軍。

由於蒙古此時係以襄樊爲主攻地區，四川及兩淮蒙軍的攻勢僅旨在牽制，在這兩地區並未大肆擴建水軍。但是，蒙古此時又責令高麗製造船艦。高麗所造船艦後來均用於一二七四年第一次征伐日本，但當初忽必烈亦有用以自海道攻宋之意。一二六八年，忽必烈遣使責問高麗元宗（1260—1274）：「今將問罪於宋，其所助士卒、舟艦幾何？」⁹⁷同年又對高麗使臣李藏用（1202—1272）說：「自爾來者言，海中之事，於宋得風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而夕至。」「今出軍，爾等必疑將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爾主當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載四千石者。」⁹⁸忽必烈有自高麗由海上攻宋之意甚爲明顯。⁹⁹而且同年他又派遣都統脫朶兒（Todor）及統領王國昌（？—1271）至高麗視察攻宋最爲便捷的出發點黑山島。¹⁰⁰此一海上攻宋計畫未得實行，可能由於蒙古人對海上航行及作戰全無經驗，爲免重蹈金海陵王水師覆滅的前轍，不得不取消計畫。宋文天祥（1236—1283）於一二五六年所上對策中說：「彼未必不朝夕爲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短於舟，疏於水，懼吾唐島之有李寶（？—約1165）在耳！」¹⁰¹此策雖非寫於忽必烈之時，却反映了忽必烈不能自海上攻宋的原因。

蒙古雖然不能自海上攻宋，但襄樊地區的水軍已足與宋軍相抗衡。蒙軍在襄樊歷次戰役中投入的艦次及水軍人數甚爲龐大，¹⁰²有效地執行了封鎖

95 元史卷131，頁3582，「張榮傳」。

96 元史卷151，頁3564，「薛塔刺海傳」。

97 高麗史卷26，頁396b，「元宗世家」。

98 同上，卷102，頁202b—203a，「李藏用傳」；元高麗紀事（學術叢編本）14a—14b。

99 日本學者池內宏則認爲：元廷責令高麗造艦爲攻宋云云，不過爲一口實，其實際目的則在攻日。可備一說，見池內宏，『元寇の新研究』（東京，1931），頁44—47。

100 高麗史卷26，頁397a，「元宗世家」；元史卷167，頁3926，「王國昌傳」；元高麗紀事15b。

101 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四部叢刊）卷3，頁16a，「御試策一道」。

102 據陳世松等的統計，在襄樊戰役中，蒙軍先後投入約13,300艦次，水軍約十五萬人（陳世松等，前引書，頁206及376）。但此一統計有待商榷。該書頁206之表將蒙古軍前後所製船艦

水道、阻擋敵援的任務。襄樊之役的十五次水戰中，蒙元軍獲得十三次勝利，十次阻援成功，¹⁰³ 宋軍每次馳援均投入甚大人力、物力，有時多達戰艦三千艘、戰士十萬人。蒙元水陸軍阻援成功，不僅使襄樊二城因彈盡援絕而告陷落，而且使宋朝軍力——尤其是水軍——損失甚大，為以後滅宋減少甚多阻力。

(五)

襄樊於一二七三年陷落後，宋朝中路門戶洞開，各戰區首尾不能相應。蒙元滅宋的時機乃臻成熟。忽必烈遂於一二七四年命伯顏（Bayan，1236—1294）、阿朮率領大軍由漢水入長江，長驅東下，並在四川及兩淮發動牽制性的攻勢。伯顏大軍於一二七五年進佔長江下游重鎮建康，然後兵分三路，明年會師臨安，迫使宋廷投降。

此一階段的宋元戰爭，主要決戰於長江之上。水軍重要性更見增加。自奪取襄樊後，蒙元便立即在各戰區進一步加強水軍，積極備戰。襄樊方面，忽必烈再度接受劉整建議，教練水軍五、六萬，並在興元金州、洋州及汴梁等處造船二千艘。¹⁰⁴ 同年六月，又敕襄陽造戰船千艘。¹⁰⁵ 曾在高麗督造戰船的招討使蔡公直又在襄陽參與督造戰艦、運舟的工作。¹⁰⁶ 一二七四年，元廷又命造戰艦八百艘於汴梁，當亦供荆襄及兩淮使用。¹⁰⁷

兩淮方面，水軍亦有所加強。一二七四年正月，敕荆湖行樞密院以軍三萬及水、弩、砲手隸淮西行院。¹⁰⁸ 同年六月，時已調任淮西行中書省（淮西行院改）左丞的劉整又請求增加甲仗及水、弩手，得到批准。¹⁰⁹ 明年二

及所練水師與歷次戰役所投入之船數、人數合而計之而得出上述二數。但是歷次投入戰鬥之船艦及水軍應係來自上述製造的船艦及訓練之水軍，兩者不應相加。

103 李天鳴，前引書，第二冊，頁1090—1091。

104 元史卷8，頁148，「世祖紀」。

105 同上，卷8，頁150，「世祖紀」。

106 同上，卷165，頁3883，「蔡公直傳」。王磐「蔡公元帥先塋之碑」（畢沅等編，山左金石志「嘉慶二年刻本」卷21，頁23b—26b）未言及其督造船艦於襄陽之事。

107 元史卷8，頁153—154，「世祖紀」。

108 同上。

109 同上，卷8，頁155，「世祖紀」。

月，元廷又以河南戰船千艘送至邳州（江蘇邳縣）。¹¹⁰六月，又以漣海新附人丁順等括船千艘，送淮東都元帥府。¹¹¹淮西艦隊後在安慶與荊湖大軍會合後，參加了丁家洲、焦山等重要戰役。¹¹²在四川戰區，蒙古人管軍萬戶速哥於一二七四年領成都高哇哥等六翼及京兆新軍，教習水戰，後得出任成都水軍萬戶。¹¹³總之，發動長江攻勢的前夕，蒙古各戰區水軍實力皆有所增長，而擔任主攻的荊湖行中書省（由行樞密院改）麾下之水軍尤其強大。

在一二七四年至一二七六年對宋總攻擊中，水軍已成為攻擊主力，而蒙勝宋亡是決定於長江上的三大水戰。一二七四年十二月鄂州渡江之役，蒙宋雙方各有船艦萬艘參戰。¹¹⁴但是宋皆巨艦，蒙元船隻十不當一。¹¹⁵蒙軍却巧妙運用側背迂迴戰術，順利登陸長江南岸。並在青山磯、滸黃洲江面，擊敗宋朝水軍，擄獲戰艦千餘艘。¹¹⁶由於此役的勝利，蒙軍得以控制長江中游，並順江而下。一二七五年二月丁家洲（安徽銅陵東北）之役，蒙軍以水陸三面夾擊的戰術，擊潰宋宰相賈似道所率的戰船五千餘艘，十三、四萬人的大軍，並擄獲戰艦二千五百艘。¹¹⁷同年七月的焦山（江蘇鎮江北）之役中，宋都督總統張世傑（？—1279）動員萬餘艘戰艦，而且其中多為黃鵠和白鷁式的海上戰艦。¹¹⁸蒙軍運用火攻，擊潰在焦山南北面組成方陣的宋朝艦隊，擄獲七百餘艘戰艦。¹¹⁹此役中，宋朝江上水軍毀滅已盡，而海上水軍大部亦多已摧毀。

110 同上，卷8，頁161，「世祖紀」。

111 同上，卷8，頁168，「世祖紀」。

112 同上。

113 同上，卷131，頁3182，「速哥傳」。

114 劉敏中，平宋錄（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上，頁267；「經世大典序錄·征伐·平宋」，國朝文類卷41，頁16a；元史卷8，頁158，「世祖紀」。

115 劉敏中，中菴集（四庫全書本）卷15，頁22a，「薩木丹公神道碑」。

116 陳世松等，前引書，頁250—253；李天鳴，前引書，第二冊，頁1155—1161。

117 陳世松等，前引書，頁263—265；李天鳴，前引書，第二冊，頁1185—1188。

118 「經世大典序錄·征伐·平宋」，頁17b。

119 陳世松等，前引書，頁301—303；李天鳴，前引書，第二冊，頁1225—1227。

(六)

焦山戰役後，蒙元水軍在河川上作戰的使命已告完成，而海岸作戰的階段於焉開始。一二七五年冬，蒙元軍自建康分三路向宋行在臨安發動總攻擊。其中左路軍即為董文炳所將之「水陸精兵數十萬人」，由江陰出發，出江入海，在鹽官（浙江海寧西南）登陸，與伯顏所率中路軍及阿剌罕（Alaqaṇ, 1233—1281）所統右路軍會師臨安。迫使宋廷於一二七六年正月出降。此後，蒙元水軍又在清剿浙、閩、粵沿海宋軍及在一二七九年崖山（廣東新會南海中）一役擊潰宋室最後抵抗力量上起了決定性作用。

過去蒙元軍因缺少海上水軍，未能自海上攻宋。蒙元水軍原為河川作戰而建立，所擁船艦，顯然多不適航海。海上水軍是在焦山戰役前後逐步形成的。其船舶主要來源有三：一為自製，一為擄獲，一為宋朝降人的奉獻。蒙軍前後自製的海船為數不少。一二七五年佔領建康後，千戶寧玉督造巨艦可勝萬斛者，¹²⁰ 此等巨艦之建造當不是為江上之用。焦山戰役後，阿朮命招討使王世強白鵠海船百艘，並自四十一翼萬戶中，摘派漢軍三千五百、新附軍一千五百，由王世強及哈刺解統之，此乃成為董文炳統以出海的水軍核心。¹²¹ 臨安陷落後，哈刺解升任沿海招討副使，奉命督造海船千艘。¹²² 宋朝建造海船最重要的為明州（浙江寧波）、泉州、廣州等地，¹²³ 這些地區紛紛落入蒙軍之手，蒙軍營建海舟，乃能得心應手。

蒙軍在歷次戰役中擄獲的宋朝海船為數甚為龐大。焦山一役即已奪得黃鵠、白鵠海船七百餘艘。以後蒙軍在東南沿海追剿宋軍的歷次戰役亦屢有斬

120 同註94。

121 元史卷132，頁3215，「哈刺解傳」。羅榮邦教授認為：蒙元水軍的實力在長江戰役結束時已自襄樊之戰之「四翼」擴張至「四十一翼」。此一說法乃係對元史「哈刺解傳」的誤解。襄樊之役的四翼係指水軍四萬戶。一二七五年時蒙元水軍絕無四十一萬戶之多。「哈刺解傳」所言「就四十一萬戶翼摘漢軍三千五百、新附軍一千五百，俾哈刺解、王世強并統之」中之「四十一萬戶翼」乃指士卒摘發所自之萬戶，絕非說此時水軍有四十一萬戶翼。元代水軍從無四十一萬戶之多。自襄樊之役至焦山戰後，蒙元水軍實力增加不少，但應無十倍之多。

122 元史卷132，頁3216，「哈刺解傳」。

123 章巽，前引書，頁66。

獲。如一二七六年元軍陷興化（福建仙遊東北），擄獲海船七十八艘。¹²⁴同年砲水手元帥薛四家奴敗宋軍於灤江，獲戰艦千餘艘，其中當有不少海船。¹²⁵又如哈刺縛及元帥劉深於一二七七年與宋張世傑軍大戰于廣東七洲洋上，擄得船二百艘。¹²⁶此外，宋朝降人先後也奉獻了不少海船，最有名的例子爲朱清（1237—1303）、張瑄（？—1303）及蒲壽庚。朱、張二人是以崇明島爲基地的海寇，多年縱橫海上，實力甚大。¹²⁷董文炳派遣王世強及千戶董土選招降成功，得海船五百、衆數千人。¹²⁸這些船舶及人員遂成爲董文炳自海道攻宋武力的一部份。阿刺伯裔蒲壽庚曾在泉州「擅蕃舶利者三十年」，受宋任命爲泉州市舶司及福建沿海都制置使，其下當有大量海船。他於一二七七年一月投降蒙古，得任閩粵大都督、兵馬招討使，其龐大船隊自爲蒙古所用。壽庚本人亦曾於一二七八年三月與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進擊宋帝昀（1276—1278）、帝昺（1278—1279）。¹²⁹

由於宋水軍主力在一二七五年已告摧毀，而蒙元海上水軍不斷增強，後者在歷次戰役中皆未受到甚大抵抗。董文炳進攻臨安時，經行之處如江陰、許浦、澈浦等地原爲宋水軍重要基地，却都聞風而降，使文炳所率水軍不戰而抵臨安。奪取臨安後，元廷任命王世強爲沿海招討使，哈刺縛爲副使（後升爲沿海經略使），¹³⁰負責綏靖東南沿海任務，曾先後在浙西、福建、廣東作戰，雖未經歷大規模海戰，却達到逐漸消滅南宋殘餘力量的目標。而海上水軍在徹底消滅宋朝的崖山之戰更擔負了獨腳重任。崖山爲宋帝行在所，忽必烈爲徹底消滅宋朝，乃派遣蒙古漢軍都元帥張弘範（1238—1280）與江

124 元明善，「河南行省丞相高公神道碑」，國朝文類卷65，頁18a。

125 元史卷151，頁3564，「薛塔刺海傳」。

126 危素，危太僕文續集（吳興劉氏嘉業堂本）卷8，頁2a，「合魯公家傳」。

127 關於朱清與張瑄，參看陳登原，「朱清張瑄與海上交通」，新中華3：8（1934），33—40；夏定城「元朱清張瑄事跡錄」，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3（1943），頁1—29；Tien Ju-kang（田汝康），“Mongol Rulers and Chinese Pirates,” *History Today* 33（1983），pp.33—38；植松正，「元代江南の豪民朱清張瑄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27：3（1968）46—71。

128 「藁城董氏家傳」，頁9b—10a。

129 關於蒲壽庚，參看，桑原隲藏，馮攸譯中國阿刺伯海上交通史，上海，1930；羅香林，蒲壽庚傳，台北，1955；羅香林，蒲壽庚研究，香港，1959；陳自強，「蒲壽庚宋末提舉市舶三十年說考辨」，載於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編，泉州伊斯蘭教論文選（福州，1983），頁251—255。

130 同註122。

西行省參知政事李恒（1236—1285）會兵進擊。在一二七九年二月發生的崖山海戰中，宋軍有艦千餘艘，內大船極多，而蒙元方面僅有船艦四、五百艘。而蒙元艦隊憑藉正確的戰術與充沛的攻擊精神而擊潰了宋朝艦隊，帝昺蹈海而死，宋朝遂亡。¹³¹ 崖山海戰，不僅結束時逾四十年的宋元戰爭，也是蒙元水軍發展的一個高峰。

（七）

以弓馬稱雄天下的蒙古人能够建立強大水軍而覆滅憑藉水軍立國的南宋，表面看來，似不無意外。實際上，並非無踪跡可尋。蒙古之能够建立強大水軍主要由於兩點原因。

第一、蒙古人對環境的適應。蒙元水軍的誕生與成長乃是經過數代人之努力。自蒙古人初入中原，至滅宋止，前後近七十年。在此七十年中，隨着作戰環境的變換，不僅蒙古朝廷對水軍重要性的體認日深、蒙古、色目將士對水戰奧秘的掌握也日益牢固。在蒙宋戰爭中、後期，不少蒙古、色目將領擔任水軍統領而能有卓越之表現。騎戰與水戰之技巧原得自後天的培養，而非來自先天之稟賦。蒙古人在進入中原六十餘年後掌握水戰之奧妙並不意外。過去論及蒙元海外遠征盡告失敗者，往往歸因於蒙古人不善水戰，可能不盡正確。

第二、蒙古人充份利用中土的人力、物力與技巧。營建強大水師的先決條件很多，不僅需要「使船如使馬」的舵工、水手，驚濤駭浪中飛戈走戟、一如平地的戰士，以及熟諳水戰戰術的將領，而且還需要大量的木材、帆布、繩索以及卓越的造船技術。蒙古人善於運用漢人、南人的資源以補本身之不足。漢地船材、水手皆不如江南充裕，而造船技術亦較落後，但蒙古人對漢地這些有限資源加以有效動員，故能發揮效用。成吉思汗即已利用漢人張

131 關於崖山海戰，參看陳世松等前引書，頁356—361；李天鳴，前引書，頁1473—1483；湯翼海，「宋代崖門之役史實補遺」，大陸雜誌33:6(1967)，頁12—17；饒宗頤編，九龍與宋季史料，香港，1959。此外 H.W. Huber 撰有“Between Land and Sea: The End of the Southern Sung,”自文學觀點，尤其是文天祥的詩論崖山海戰，該文載於 A. T. Tymieniecka (ed.), *Analecta Husserliana*, Vol. 19(1985), pp.101—128。承閔道安（Achim Mittag）博士惠寄該文影本，謹此銘謝。

榮等造船，蒙宋戰爭更先後在汴梁、鄧州、陝西等地造船，都是利用漢地的技術與物資。在河北、山東——也就是古代之燕、齊——之居民，自古便以善於航海見稱。而內陸臨近河川、湖泊地區也有不少「善水戰」之「水鄉人」。132 現知蒙元水軍將領中，十之六、七皆為漢人，而以河北、山東人為最衆。他們乃是因「善水戰」、「有鼓櫂之勇」而得重用，133 負責建立並統率水軍。其中解成、張榮實、張禧、張榮、薛塔刺海、張札古帶等人的子孫都是世統水軍、砲水手軍、或船橋軍。蒙宋戰爭中，此等漢人水軍將領貢獻甚大。終元之世，水軍也多由其家族所控制。而在蒙宋戰爭中之水軍士兵也多自漢軍單位轉調而來。羅榮邦教授認為後來元朝之水軍不過是南宋水軍之復活，並不完全反映實情，134 因為元朝水軍是以漢人為骨幹。

水戰本為南人之長技。蒙宋戰爭中，蒙元不斷運用其所控制南人地區的資源增強其水軍，變敵長為己長，襄樊戰役時大肆擴建水軍主要出於宋降將劉整之建議，而七萬水軍之訓練也由他負責。蒙元水軍之壯大，劉整無疑為一樞紐人物。由於宋降將之助力，蒙軍乃能盡得宋水軍之奧秘。蒙宋後期之戰艦，大部逐次建造於南宋境內之荆襄、四川、建康、明州等地，蒙元顯然利用了此等地區之物力並吸收了宋人先進的造船技術，可能正如王恽所建議：「舡艦～依宋法」，可惜已無足夠資料可以詳考。水軍的運作有賴舵工水手，蒙軍在歷次中大量招募南人水手，其船艦始得運作自如。135

由於上列原因，蒙元水軍日趨強大。但是，不僅長江階段諸役，即在崖山海戰中，宋艦隊仍佔船數上之優勢。蒙元水軍為何能擊敗歷史悠久而數量上又佔優勢的宋朝水軍？要解答此一問題，必須自宋蒙戰爭的整個局勢以及雙方水軍的各種條件兩個觀點着眼，加以分析。

132 元史卷151，頁3567，「王義傳」；參看紫山集卷18，頁35a—40b，「行深冀二州元帥府事王公行狀」。

133 同註59及94。

134 Jung-pang Lo, "The Emergence of China," p. 492.

135 蒙元招募南人舵工、水手之例很多。一二三六年宋起居郎吳泳奏稱蒙軍以厚利引誘宋朝舟師（鶴林集〔四庫全書本〕卷20，頁15a，「邊防劄子」）。一二五九年游顯督別帖萬戶戰船，篙師不足，顯自降人中選取九百名能操舟者而用之（同註83），一二五七年宋吳潛奏稱，蒙古漢將李壇造船海州，且厚以銀兩召募南方水手（許國公奏議卷3，頁87—88，「奏曉諭海寇復為良民及關防海盜事宜」）。又據文天祥說，張弘範率以征崖山的艦隊中，水手皆閩、浙人（見文山全集卷16，頁10a—10b，「集杜詩·詳興·序」）。

水上戰爭是蒙宋戰爭的一環。而戰爭的勝負又與雙方整體政治、軍事情勢密不可分。宋朝季年，政治腐敗，重臣相互傾軋，領導乏人，戰和不定。而且南宋一向重文輕武，以致兵備鬆弛，將士素質與士氣兩俱低落，缺乏統一指揮，將領黨同伐異，不能團結，戰略戰術被動消極。¹³⁶ 反觀蒙元方面，事事與宋朝相去甚遠。自忽必烈立國中原，摧毀南宋，一統華夏，已成為其首要政治與軍事目標，其間雖經歷不少內憂，却仍能貫注於此一目標。忽必烈本人運籌於上，採行正確之政略與戰略。其下伯顏、阿朮、張弘範等人將材優異，指揮統一，嚴格執行忽必烈所定策略，而且蒙元軍軍紀嚴格，賞罰分明，士氣與訓練皆遠勝於宋軍。雙方勝敗之勢，甚為明顯。

從雙方水軍各種條件來考察，宋敗蒙勝亦非偶然。第一、蒙元水軍為一新興力量，吸收了宋水軍之優點，而少其缺點。宋朝水軍則早已趨於衰敗。據羅榮邦教授的研究，宋朝水軍於一一六四至一二〇四年間達到巔峰。其後，在量的方面雖略有增長，但質的方面衰落甚遽。蒙宋戰爭開始後，水軍損耗甚大，未能及時補充，以致船隻短少，士兵缺額，訓練不良，士氣不振，而且不斷徵用商船，亦使商船主離心離德。¹³⁷ 吳潛即曾屢次奏陳水軍衰敗情狀。如在一二三九年他指出鎮江水軍五千人，其中「人物堅壯可以出戰者，極不過五百人，餘皆疲癯脆懦、纖細短弱，指一可什，決不能於驚濤巨浪之中，飛戈走戟，擊刺如神，此皆三十年之積弊。」¹³⁸ 十四年後，他對定海水軍亦有相同印象，可見情形未見改善。¹³⁹ 他因而感嘆說：「使天祐國家，虜馬不至於飲江，猶之可也。萬一如叛臣宗雄武、金之才輩之慮之計，則江南之事，豈不甚岌岌乎？」¹⁴⁰ 可見在這位邊防重臣心目中、水軍已無力擔負江防、海防之重任。襄樊戰役期間，上官渙上封事說：沿江水軍「如京口（鎮江）、龍灣（建康）、采石舟師粗整，稍堪調用。池陽（即池州）而上，大體疏鹵。每隘不過二、三千人，船三、四隻，備禦疏漏，見之令人心寒」，¹⁴¹ 亦可看出長江中游以上水軍衰敗的情形。總之宋季水軍已是外

136 參看陳世松等，前引書頁374—380；王瑛，「綜析伯顏攻宋戰爭中南宋滅亡的原因」，載於胡昭曦編，前引書，頁244—297。

137 Jung-pang Lo, "Maritime Commerce," pp. 91-100.

138 許國公奏議卷3，頁62，「奏乞增兵萬人分屯瓜州平江諸處分拓內外」。

139 同上，卷4，頁94—95，「條陳海道備禦六事」。

140 同註138。

141 佚名，咸淳遺事（粵雅堂叢書）下，22a—22b。

強中乾，非復當年盛況。

第二、戰略、戰術的優劣。宋軍在戰略、戰術上皆採被動消極的單純防禦，其水軍亦然。但是，水軍是一種機動軍種，用於攻擊，最為有效，功能與騎兵相近。宋軍却未能運用優勢水軍作為戰略攻擊的工具。主要用之為水路馳援、解救危城的防禦手段。襄樊被圍期間，名儒金履祥（1232—1303）曾上書朝廷，建議派遣重兵，直搗幽薊，以牽制襄樊蒙軍。¹⁴²此一以水師為主力的大膽攻擊策略，顯然未被採行。宋朝幾次派遣水軍北上突襲，規模甚小，無法發生作用。蒙元方面，早期水軍由於實力不強，僅用作輔助攻擊。但在長江戰役階段，水軍已成主攻的兵種。在戰術的層次，宋艦隊在大規模水戰中多採被動防禦。如在焦山戰役，宋艦每十艘連為一舫，貫以鐵索，沉碇於江。¹⁴³崖山之役，宋方也是「綦結巨艦千餘艘，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¹⁴⁴這種以船艦結為城堡的被動防禦完全忽視水軍機動的特長，不僅陷於被動挨打，而且多遭火攻而致覆滅。與宋軍相反，蒙元多以水軍作為攻擊的工具，靈活運用正面攻擊、側背迂迴、水陸協同夾擊等戰法，勇猛攻擊以破敵主力。¹⁴⁵由於戰術不同，宋水軍多倚恃大船。大船威力雖大，但缺乏機動性，運作全靠風力，無風則陷於被動。焦山之役，宋艦便因無風而致挨打。¹⁴⁶而蒙古水軍則善於運用「水哨馬」、「拔都兵船」等輕舟，取其往來如飛，便於攻擊之利。總而言之，宋軍似以水軍執行守城步兵的功能，而蒙軍則以水軍用作衝鋒陷陣的騎兵。這種運用上的差別，不僅反映兩軍策略及士氣上的歧異，也反映兩國軍事傳統的不同。

第三、陸上協同作戰力量強弱的差異。蒙宋戰爭中之水戰絕大多數發生於內陸河川之上。內陸水戰與海戰有一明顯的差異。海戰中水軍獨力作戰，旁無倚恃。而內陸水戰中水軍多與步騎兵協同作戰，步騎兵的表現往往影響水軍的勝負。蒙元水軍原來雖處於弱勢，但其陸上協同作戰力量遠勝於宋，因而每每憑藉步騎兵的支援而擊敗宋朝水軍。

總而言之，蒙元水軍乃是適應對宋作戰的需求而產生與發展。水軍的有無與強弱影響了蒙元對宋戰略與戰術的採行，而戰略的變化又促使水軍逐漸

¹⁴² 金履祥，仁山金文安公文集（金華叢書）4，「附編」，章贊，「金履祥傳略」。

¹⁴³ 元史卷128，頁3122，「阿朮傳」。

¹⁴⁴ 宋史卷47，頁945「二王紀」。

¹⁴⁵ 參看李天鳴，前引書，第三冊，頁2048—2054。

¹⁴⁶ 袁庭棟、劉澤模，前引書，頁381。

壯大並擔負日益重要的角色。最初水軍僅有補助騎、步兵作戰的作用，後來却成長江、大海上攻擊並消滅宋朝武力的主要兵種。倚恃此一水軍，蒙古人得以攻克華中、華南的地理障礙及宋朝的水上優勢而統一中國。

從蒙元水軍發展的歷史看來，蒙古人之能征服歐亞並一統華夏，騎兵之強大並非唯一原因。更重要的是蒙古人能不斷適應不同地理環境，增加新兵種，吸收新戰法，並充份動員當地一切資源，以供作戰之需。¹⁴⁷ 蒙宋戰爭中建立強大水軍並恃以攻滅南宋便是這種適應力與動員力的充份表現。金哀宗（1224—1234）曾說過：「北兵所以常取全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¹⁴⁸ 這位亡國之君一語道破蒙古人戰無不勝秘密之所在，其言較前引李德·哈特所說更為周延。¹⁴⁹ 而水戰正是蒙古人在蒙宋戰爭中學習而得並恃以滅宋的一項「中國之技巧」。

147 Thomas T. Allsen 即認為蒙古人最善於動員其所控制地區之資源，見所著：*Mongol Imperialism. The Policies of the Grand Qan Möngke in China, Russia, and the Islamic lands, 1251-1259* (Berkeley, 1987), p. 7.

148 金史卷119，頁4b，「完顏襄室傳」。

149 同註7。

The Rise of the Mongol-Yüan Navy and the Mongol-Sung War

CHI'I-CH'ING HSIAO

This i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how and why the Mongols, the greatest cavalry power of the time, were able to overcome the vast superiority of the Southern Sung's naval power, destroying the latter in 1279 after winning an unbroken sequence of battles fought on the Yangtze 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birth of the Mongol navy was necessitated by the geography of Central and South China and the military needs in the protracted Mongol-Sung conflict. The expansion of this navy and the strategies adopted by Qubilai closely influenced each other. The role of the Mongol navy changed over time from that of an instrument for intercepting reinforcements sent by the Sung court to the besieged cities, to that of the chief arm of offence as a result of its growing strength and the changes in Qubilai's strategies. The success of the Mongols in building a powerful navy is attributed to the competence acquired by the Mongols themselves over a period of several decades and to their dexterity in using the talent and manpower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ese. The victory of the Mongol navy over its Sung counterpart should not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their quantitative strength, but in terms of the decline of the Sung navy,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and tactics adopted by the opposing sides; and in terms of the support the navy received from the respective land forces. All in all, the Mongols' adroitness in building a powerful navy and using it effectively, reflects their adaptability to different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 and their competence in mobilizing the local resources for the purpose of war and conquest, one of the keys to the Mongols' success in empire building.